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七十二期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

编者的话：在“高饶事件”中，栽给高岗的罪名是“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这是高岗死活也不愿承认的。首先，高岗反对刘少奇，“反对”等于“篡夺”，是诛心之论。再者，篡逆谋反是弥天大罪，意味着政治上的死刑。

“高饶事件”是发生在中共由造反党变为执政党的转型期的一次内斗。此时，党的任务由革命战争转变为经济建设，党的组织迅速官僚化，通过专业划分和科层制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制。而同时，毛作为这个党的领袖，以革命时期积累的资源 and 权威日益泡沫化，面临被架空或边缘化的危险。因此，他一是通过亲信高岗建立“经济内阁”来削弱周恩来的实权，二是在两个会议上发难打击刘少奇的势力，以掌握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双方“政治路线”的分歧在于：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形成的新式官僚阶层更倾向于前者，并且更倾向于把政治分解为行政与事务性工作。

与以往党内斗争不同，这次毛遇到盘根错节的“体制”的抵制。同时，他的“非组织活动”也因高岗的鲁莽张扬遇到了麻烦。毛的斗争策略历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高岗便当了替罪羊。

这是一场体现为政治斗争的个人和山头的权力之争。事后在中央对“高饶事件”的《决议》中，回避了政治分歧的表述，只谈权力问题（分裂、宗派、企图篡夺领导权力），因为在前一点上，批高等于批毛。这似乎印证了高岗对自己的评价：“政治上对，组织上错”。

高饶事件也为观察此后一段时期中国政治的走向提供了线索。当毛意识到通过内部斗争无法达到目的，就开始动员体制外的力量，比如发动一次又一次群众政治运动，在体制外制造并集结造反派大军等等，来打击甚而试图炸毁这个官僚体制……

“高饶事件”虽暂告一段落，但伏笔已经埋下。十多年后，当毛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刘的“资反路线”，当高岗提议的总理人选林彪做了“接班人”，当刘少奇终于成为“叛徒”，当如日中天的林副主席与高副主席一样“没有好下场”时，谁敢说这只是巧合呢？

本期内容摘编自赵家梁、张晓霖著《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 2008年出版）。

高岗反省检查

赵家梁 张晓霖

打开一叠被尘封了近50年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纸片——当年高岗反省的原始谈话记录，笔者的心情激动起来。这是一些规格、质地不一的纸片，既有信笺纸、稿纸，也有坐标纸、笔

记本纸；有横格的，有竖格的；有钢笔写的，也有铅笔写的；字迹有大有小，记录稿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些胡乱涂画的外文字、图画之类，也有一些简单的不连贯的词语。这是高岗谈话间断时，赵家梁为打发等待时间而胡乱涂画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纸。唯其如此，它们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逃过劫难，保存下来。这些乱七八糟、不像样子的纸片，成为我们了解高岗其人的珍贵资料。

高岗的情绪平静以后，对自己的学习、检查和反省提出五个步骤：一提（提醒）、二记（记忆、帮助记录）、三检（查）、四结（写出反省稿）、五交（反省稿子送交中央，听候党的处理）。他还要求看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要求赵家梁帮他整理反省材料，进行文字加工。这两条，周总理都同意了，但他强调，反省内容必须是高岗自己的，最后送交中央的反省稿，也必须由高岗亲自核定亲自抄写，不能由别人代笔。

开始的一段时间，高岗每天上午学文件，下午两点半开始谈两个多小时。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大纲式地谈他的主要经历和主要问题，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赵家梁在一旁记录，然后整理抄清，交给高岗作进一步检讨反省时参考。

1954年4月中旬着手写《我的反省》。他逐字逐名斟酌推敲、反复修改，最后定稿，亲自抄写完成《我的反省》，4月30日送交中央。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高岗对东北建设时期和北京时期主要错误的反省检查。

一、与刘少奇的关系

他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

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1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在延安、在东北，在1947年以前，我对少奇是尊重的。1946年初，当时东北局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厉害，林彪跟我商量，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要求派少奇到东北来主持工作（后来因为形势紧张未成行）。这说明我当时对少奇是尊重和信任的。”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鲜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这些都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电文’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

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遂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 20 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说到这儿，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四中全会和座谈会，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

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赵家梁：“说心里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

这天下午和以后的几天里，高岗就这个问题反反复复谈了好多次，一再申明，反对少奇不是为了自己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问题，实现毛主席的一大心愿。

二、反刘的主要言行

（一）接班人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比如主席对少奇的不满和担心；查看敌伪档案，了解少奇是否有自首变节行为，以及关于大权旁落的问题等等，我都跟陈云讲了。1953 年上半年，我们一起议论过好几次，一致认为：毛主席确实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把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主席的意愿，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而且最好在‘八大’以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议论过，这件事由谁出来挑头比较合适？怎么搞法？谁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陈云认为这件事由我挑头最合适；要我先搞起来，搞确实后再告诉毛主席。我都同意了。我们还说到林彪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

“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同一些领导干部交换过意见，确实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我说过“少奇‘左’右摇摆，很不稳。要是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现在主席健在还好，他们不敢怎么样。要是主席不在了，那还不乱了天下！”

“关于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我向人散播说，主席讲，他只当党的主席，让少奇当政府主席、议会议长或当什维尔尼克。‘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不是主席说的，是我伪造的。现在有人说我假借毛主席的旗帜反对刘少奇，我承认这是事实。但说我‘伪装拥护毛主席’却不是事实，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我是真心拥护毛主席、效忠于毛主席的。”

“毛主席提出，他不在北京期间，是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还是由几个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我跟陈云、邓小平说过轮流好，不支持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杭州时，也曾跟林彪、陈正人说过这个意见。”

“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而且不该听信陈云的话。他叫我先干起来，等搞出名堂以后再告诉毛主席。

结果现在说我‘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我怎么说得清呀！”

（二）散播流言蜚语

“财经会议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对少奇和彭真、薄一波等人不满，刘少奇一手提拔的饶漱石也不例外。那时，各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几次来谈工业经济建设及其他工作问题，很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他们说：‘你们东北局搞得好，有经验，怎么搞法？’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对少奇不满，而对我不错。我非常得意，向他们散播刘少奇的不少坏话，造成‘毛主席已不信任少奇’的不良影响。当时流传所谓我家里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大区支持第二司令部。’”

“我散播的流言蜚语，如：

说少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少奇过去搞人性论，受到毛主席批判；在方针政策方面，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少奇提出来的，是错误的。毛主席在柳树店休养时说了，校场口事件表明，根本没有‘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央工委在平山土地工作会议的决定有‘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对山西农村互助合作社的批示是右倾表现；城市资产阶级政策，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是‘右’的观点；我还让人转抄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以此攻击刘少奇；说他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套；职工运动的错误不完全是李立三的，而与少奇有关；评议整党，少奇说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说城市共产党员可以开工厂剥削，农村党员可雇工，富农可以入党等问题，都是错误的，东北顶了他；那次去苏联时，老头子（指斯大林）对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还讲过抗美援朝决策时，少奇同志也不那么坚决等等。”

“在组织问题上，我说过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还议论过，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各大区应调一些水平高能力强的人加强组织部”；说“少奇打算调李雪峰去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说李是否顺手一点，陈正人不顺手”；还散播“少奇说‘陈正人身体也很差’，打算让李富春做建委主任”；和陶铸说，“少奇对广西的工作不那么明确地支持。财经会议时，陶铸听说要调他去政法委员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还不是调虎离山。这些都有挑拨的意思。”

“我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好像少奇在重要政策上是不稳的。这是当时的认识。我把这些当成自己所需要的，抓辫子，并加以夸大，在背后议论散播，说刘少奇不稳，不能掌舵”；“我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实际上是指桑骂槐。”

“这些问题，跟大区的个别同志谈过，和中央的几个同志，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林彪、黄克诚等都谈过，和东北的张秀山、张明远等人也谈过。”

“现在检查起来，对这些问题应该正确对待：

‘人性论’是一时的认识，毛主席指出来以后，就根本不存在了。

‘和平民主新阶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形势的估计，随时十分正确是极难的。关键问题是在实际工作部署上，还是在准备战争，事实上并没有影响。

平山土地会议，是有‘左’的错误，但中央、少奇，特别是毛主席抓住这个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农村互助合作，中央已作了决定，这个问题也已解决了。

党的性质和雇工问题也是解决了的。

对资本家的问题，当时是城市需要稳定，怕乱，搞乱了损失更大。”

“对这些问题，我本来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少奇同志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向主席反映。但自己却是抓他的辫子，想搞确实一些再向主席讲。”

“有的问题，我和主席谈过，他两次要我当面和少奇同志谈。主席说：‘少奇是老实人，

你和少奇同志谈；别人谈，要制止。’要我当面谈，我不谈。以后谈的时候，提得不明确，谈得不清，谈得不够。”

“事实上，不论在几大运动，还是在党的建设发展等方面，少奇同志都是正确的，有贡献的。反过来，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不是自己看出来的。自己装懂、吹嘘，拿中央正确的东西打击少奇同志。应该和少奇谈，但没谈，已是错误；还要有意地打击少奇同志，我这人是坏极了。对少奇，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本不像个人，不像个共产党员。”

（三）关于党史和“八大”代表

高岗曾对人讲，明年（1954年）抓四项工作：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为召开“八大”作准备；四是制订宪法、召开人大。

关于编写党史，他说：“编写党史，我认为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割成根据地历史和白区历史两大块，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是很小很小的部分，不能和苏区相提并论”；“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扯皮促退的一面”；“要以苏区的历史为主来编写，要趁主席健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七大’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

关于选“八大”代表，他说：

“‘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否则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要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主要是要从工作成绩来考核，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他还说：“在干部问题上，少奇肯定要乘‘八大’之机安排他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将来选‘八大’代表时，我就不选李雪峰、薄一波。”

“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这些，我跟陈云、林彪、陈正人、陶铸、黄克诚、王鹤寿等人议论过。现在想想，人家讲，你为什么把它拣起来？”

（四）“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总结发言的第三条说到高岗“利用某同志提出的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污蔑中央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谓“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是1953年春天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提出的。

高岗反省时说：“总理说的不符合事实。那份名单不是我伪造的，而是毛主席派他的机要秘书直接送来给我看的，并等我当面看了以后就拿走了。这可以查证。”

“在这之前，大约是2月底吧，当时中央酝酿体制、人事问题，毛主席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碰头、学习，议一议。少奇考虑中央分工，提出一个书记处和政府党委名单，在少数人中征求意见。其中彭真为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委、安子文管组织部、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自己有宗派观点，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是少奇安插人，所以没有重视。紧接着，主席又送来那份‘八大’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委和群众团体分工的名单，政治局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虽然安子文说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我却主观地认为安子文怎么敢？这是少奇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和各部委的人事，授意安子文搞的。这是我把党内干部看成派别性的，借以攻击少奇同志。这个政治局名单，我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人谈过。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名单上没有你。’还问过邓子恢、朱总司令知道不知道这个名单。”

“问题是，我的这些想法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而没有讲，却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这是天大的错误”；“后来又不听毛主席的招呼，私下扩散了这个名单，散播自己的错误想法；再后来，当毛主席追查是谁泄露此事的？自己又不敢承认，欺骗了毛主席。”

三、“反对周恩来”

高岗看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稿后说：“说我反对周总理，这不是事实。我承认，我曾议论过总理在历史上跟着王明犯错误，也说过他检讨过分散主义错误，说他事务主义。我这样说他当然不应该，但决不是反对他。”

他一再表示，他对总理是尊重的，绝没有反对的意思。他甚至说：“即使我真的是反革命分子，真的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也决不会蠢到这步田地，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两个对手，在反对少奇的同时，再来反对总理，绝不会！”

“有人说我不赞成恩来当总理，想让林彪当总理，甚至说我自己要当总理，绝没有这种事。”

“我记得只有一次议论过谁当总理的问题。那是在去年春天，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我说我不行。主席又问你看谁行？我说恐怕林彪比我行。此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议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和毛主席议论总理。”

“如果我真的反对周总理，真的想取而代之，就绝不会拒绝主席的意见。我不明白，这种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传出去，并且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总理’，‘自己想当总理’呢？”

周恩来听了赵家梁汇报后，愣了一分钟左右才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高岗反周。”

赵家梁向高岗转达总理的话后，他深深长叹，说：“天晓得！”

1954年2月17日上午，高岗在开枪自杀之前，没有给刘少奇留下一字一句，可见他对刘少奇之绝情。然而他却给周恩来写了托孤的遗书。信虽短，却很有感情。高岗在中央，在地方，都不乏亲朋好友或亲密战友。但在生死之际，他却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周恩来而不托付给别人，这说明他对周恩来特别信赖。

四、对干部有宗派情绪

高岗承认自己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存在宗派情绪。他说：“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有成见的，如对彭真等人，理都不理，有报复心。”

“对薄一波有宗派情绪。来北京后看到一些现象，内心不服，主要在四件事上内心不服，狭隘个人主义。”“一是东北一党员的信（此信主要是向党中央揭发东北个别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问题，未具体点名，只是泛泛说有干部腐化。高岗在离开东北前，在东北局传阅过这封信——作者注）。自己认为薄一波不应该批转这封信，他这是借‘三反’之名来敲我一下（当时薄一波是中央‘三反’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东北一党员的信’由‘三反’领导小组转给东北局——作者注）。’”“二是1952年8月间，一波在颐年堂批评东北财政上不统一，要林枫回来检讨纠正。”“三是鞍山检查组。1952年‘三反’期间，鞍钢一个高炉发生爆炸事故，中财委、重工业部、监察部、组织部等派联合工作组来调查并检查鞍钢的工作和投资使用情况。工作组尚未出发，王鹤寿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派工作组是薄一波有意与东北为难，打击鞍钢的目的是打击我高岗和东北工业部，还联系到这是薄一波对过去处理彭真问题不服气，企图报复。”

“我觉得一波认为东北工业搞得好，鞍山是最主要的。现在出了事故，就说我们把鞍钢搞得一塌糊涂，派检查组来调查。这是一波借机整我，我就不配合检查组的工作。我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一部分同志，使他们对检查组产生不满情绪。”

“后来毛主席批评一波，说不会游泳的人站在岸上看人家游泳，指手画脚容易，要真正懂得游泳，还是要亲自下水学游泳才行（大意）。我更觉得自己正确，还向东北局的同志传达了主席的话。”

“四是去年3月底，中财委召开部长会议，一波讲话出格。我认为一波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自己也就不是采取正确的态度，而采取错误的态度，说他批批点点，不解决问题。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有办法，吹嘘自己。”

“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这方面的具体事实不少。如1950年，对王稼祥说，总理很忙，你回来抓外交部吧。对黄克诚说，中央要你当政治局委员，我赞成。中央还未决定林彪任计委副主席之前，我就对陈正人说了。”

“一次中央会上谈到，‘七大’以后‘鼓出来’的干部要补选中央委员。后来我把会上提到的人告诉了其本人和与自己接近的人，有讨好的意思。这是组织纪律不允许的。同时，对一波提出的华北的几个同志，我说是否恰当，值得考虑。这些，我对陶铸、黄克诚、王鹤寿、张明远、陈正人等人讲过。这是有宗派观点，错误的。”

五、吹、装、偷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的总结中说过，高岗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吹嘘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高岗坦言：“就是吹牛、吹嘘，不懂装懂，剽窃别人的思想、言论、文章，当成自己的”；“工作上喜欢报喜不报忧，听到说你先进就舒服，说你有毛病就不高兴。”

“在延安时，自己本来政治上是很不成熟、不高明的，但是装得自己很高明。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整个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干部培养等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取得的。许多事情自己看得不是那么正确，只是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有时也还没有完全领会。但自己总是装得一切都懂，表现自己还不错。”

“在东北，与彭真的争论很多，后来证明我对、他错。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英明正确，而是陈云、张闻天、林彪、罗荣桓等许多人的一致意见。”

“到北京后，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就希望把计委机构加强一些，调一些理论水平和能力强的人到计委来，表现出自己管得不错；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于人后，表现自己，突出个人。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计委的委员和各局局长。”

“财经会议前后，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乘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

“对少奇，也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能发现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拣了别人说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散播。”

六、与洋人的关系

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有人揭发高岗里通外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的总结发言也提到这个问题。

高岗反省时，着重谈了他与苏联人交往的情况：“在中苏关系方面，是挑拨？还是向洋人吹了不该吹的牛？我认为，顶多是在个别问题上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有些事未请示中央，擅自做主，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吹了些不该吹的牛，但绝没有挑拨离间、里通外国的问题。”

他着重谈了以下情况：

（一）在东北，三次去苏联

高岗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是1947年，经中央批准去伯力割盲肠，林彪写的介绍信，与马林诺夫斯基联系的。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点枪支子弹。那时，说过刘伯承、邓小平过黄河有信心；说毛主席是中国的斯大林。问谁是中国的日丹诺夫？我说是刘少奇。”

“后来苏联经常通过领事馆传来以‘史野’名义写的文章，或送一些关于亚洲问题的宣传材料，要中国的报纸发表，我们都转给中央了。”

“第二次是1949年夏，同少奇一起去的。我绝没有所谓‘抢在刘少奇前面说话，要求苏联驻军青岛和山东半岛’这类事情。当时，我在与苏联人闲聊时说：‘你们对我们旅大和东北解放帮助很大，替我们守住了大门；有必要的时候，到青岛、威海（当时青岛、威海是国民党占领的城市）。’这些话当然不恰当，但不是在正式场合邀请苏军进驻青岛，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就我要把东北割给苏联，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那更是没有的事。当年我对苏军从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和铁轨的行为，很不满意。访苏期间，我很想向斯大林说说自己的意见，被少奇制止了。试想，连他们拆走我们的机器设备我都不愿意，怎么会主动把东北这么一大片领土白白送给他们呢？我再怎么没觉悟，也懂得这是卖国行为呀！”

“回国后，我有意抬高自己，贬低少奇，说斯大林赏识我，而不怎么满意少奇的报告，这是事实。我讲这话，纯粹是吹嘘自己。”

高岗始终否认他跟柯瓦廖夫说过刘少奇的坏话，否认说过“少奇同志组织人打击我”这类的话。他说：“在去苏联的飞机上，少奇谈对资产阶级问题的看法，冈尔斯基翻译，柯瓦廖夫问我怎么看？我说少奇这个观点有毛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谈经济问题时，我说到薄一波的问题；谈职工问题时，说了立三问题。我这样讲，是无原则的。严格地讲，对柯瓦廖夫说这些话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说刘少奇的坏话。”

“还有一次是1951年，为朝鲜和谈及苏联援朝战斗机的问题，我和金日成一起去苏联，师哲当翻译。当时，苏方有马林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他们传达了斯大林的谈话，认为战争还要坚持两年。他们讲了一大篇，我多半是解释，并讲了一下我们的几大运动。我要求他们援助朝鲜28个师，以后争取40个，再后来是60个师，增加了一倍多。我自觉无半句挑拨。如果我要干坏事，机会多得很，但我没有干。”

（二）“与洋人密谈三天三夜”

高岗说，“这件事刘亚楼最清楚。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当时我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主持司令部工作；刘亚楼是参谋长，负责与一个叫卡瓦列夫的苏联军事情报员联系。一天，卡瓦列夫来找刘亚楼要有关东北敌我军事力量消长情况对比和部队番号等资料。正好当时刘亚楼不在，就来找我。我叫秘书刘家栋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去接谈的。整个过程中，我与卡瓦列夫根本没有见面，哪来的‘密谈三天三夜’？刘亚楼有些话完全不真实。”

（三）“挑拨离间”和情报问题

“1946年1、2月间，苏联派了一个上校到宾县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

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主席、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是骑在树枝上砍树，自伐其木。我说了毛主席在 1945 年 12 月 28 日的指示；讲了退不退出城市的问题。那时感到东北城市很重要，和苏联红军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讲了，本来应该请示中央的，没先请示，这是极大的错误。但这不是挑拨离间，也不是给洋人送情报。”

“1950 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和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信一并交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

如果柯瓦廖夫的材料真是高岗提供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从 1950 年到 1953 年，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而批评或处分“里通外国”、“挑拨中苏关系”的高岗，反而对他倍加信任重用？1953 年 6 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为什么还会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

其实，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宣读了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内容是说中国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信中并未说明材料来源。周恩来读完信以后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

高岗自己的说法是：“1946 年前后，我们发现苏联在东北有 40 几部电台搞情报，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打入苏联内务部，又被派回东北收集情报。那时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情报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他们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的情报，其中就有所谓‘中共在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对苏联不友好的’之类。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内容完全失实的电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当时北满分局领导人——陈云、林彪和我，曾一起正式向苏联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

“1953 年我去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马林柯夫特意对我说：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的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国后，我马上就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如果真是我提供的情报，苏共怎么会当着师哲的面‘揭穿’我，我又怎么敢向中央汇报，敢把所谓‘与高岗有关材料’送给中央呢？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的嘛。”

（四）关于柯瓦廖夫

座谈会上，有人质问高岗向柯瓦廖夫泄露中共党内矛盾的情况，说刘少奇的坏话，说刘少奇打击他，等等。现在一些书刊也大谈此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柯瓦廖夫是 1947 年到东北的，名义上是中苏铁路的苏方代表，实际上是苏联在东北的专家总顾问。1949 年 12 月回国，以后没有回来。

高岗回忆说：“当时，东北局由我负责与柯瓦廖夫联系。他曾经跟我谈起：‘斯大林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不给你们，是要你们把力量组织起来抢天下’”，“他还问过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以后，中共干部到东北的情况、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情况，以及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过一些不利于中苏关系的话的情况等。”

“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我说确曾有过，彭真、林枫的确有错误。但 1946 年 7 月 1 日以后，中央改组了东北局，林彪负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柯瓦廖夫又问我：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苏军撤机器，外国报纸登了，李立三讲了这些话没有？我说，李立三的确讲过苏军把东北的机器设备拉走的事。林彪、陈云和我都批评他了，他承认了这个错误。其实，当时好多人都对苏军的这种做法，特别对个别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很不满意。但苏联出兵东北，总的来说是好事，对东北解放是有贡献的，所以，我们当时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要顾全大局，正确看待苏军出兵的问题。”

“我这些话是 1948 年冬讲的，当时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后来，1949 年春，我到西柏坡时，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这些情况，林彪和陈云都知道，怎么说我是挑拨离间，给苏联

人送情报呢？”

那么，高岗是否让柯瓦廖夫给斯大林带过信呢？高岗的确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但这封信是经过党中央，而不是让柯瓦廖夫带给斯大林的，和传达情报毫无关系。

那是在1949年夏初，高岗访问苏联之前，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内容是介绍东北战后恢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苏联在设备和技术上给予援助。他当然不会自己写这封信（他不懂俄文），而是由张闻天亲自起草、翻译的。这件事，张秀山、张明远、陈伯村等人都知道，并且，这封信经过东北局讨论通过以后，报送中央审批。不久，高岗与刘少奇一起访苏，东北同苏联达成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这封信可能起了积极作用。

“我到北京以后，阿尔希波夫（苏联总顾问）提出关于劳动工资的建议，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财经会议刚结束，他问中央的分工情况，我谈了一波的新税制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的问题。这些事，应该请示中央，由中央统一答复，而自己擅自讲了。”

七、生活作风

高岗承认自己在私生活方面确实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这主要发生在东北解放以后的那几年。但他毕竟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人，总要有所顾忌，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

事实上，初到北京后的一段时间，他比较谨慎，1953年6、7月以前，他从没在家里举办过舞会。一般都是去参加中直机关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周末舞会，去的人都是一些中央首长。一般周总理一走，大家就走了，高岗也就早早回家。他在中南海只跳过两次舞，有时观看文艺演出；去过两次计委的舞会。

后来，罗瑞卿和肖华对赵家梁说，要照顾好首长，要调剂好他的工作和生活，不要总是忙工作。“首长的文艺生活要组织好，你这个秘书不管不行啊。”肖华还表示可以从军队文工团找乐队和舞伴。从那以后，周六晚上才在东交民巷八号办舞会。一些书中描写他在舞会上公然拥吻舞伴，把总理气走了。还说高岗竟然把舞伴带到楼上去。这怎么可能！当时李力群、秘书等都在场，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总还要顾全一点自己的形象吧。

高岗确实通过舞会结识了一些女性，并与个别人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与高岗有不正当关系的女性并非来自舞会上，而是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交往的女同志，真正在舞会上认识的只有一个。再说，当时保密工作很严格，也不允许他在外边随便找女人。

李力群向周总理反映过关于选派年轻女孩子到高岗家里当舞伴的事，总理批评了这种做法。

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当时也引起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感与不满，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

高岗检讨时说，生活作风腐败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早在西安时，他看到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去逛妓院，他们认为当时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应该及时行乐。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极坏。开始时他很惊讶，后来也曾随他们去过几次。1934年1月，在一次战斗胜利后，他因奸污妇女而受到师党委严厉批评和处分。以后“在蒙古地工作，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无人监督，几乎每到一处，都有女人相陪，生活确实腐化。”当时他思想一度悲观消极，认为，反正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左”倾路线的人整死，过一天算一天。从那时养成放荡不羁的恶习。到延安以后，他见到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他的恶习非但未得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当他位高权重以后，一些干部投其所好，为他提供方便；一些女孩子也情愿以身相送，他也就越发地不可收拾了。

八、写下违心之词

高岗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性的认识，与中央的结论相距甚远。一直到1954年4月2日，他在反省中根本没有说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及有野心的问题。

高岗心里明白，不作一个“像样的”检讨是过不去的，总这样顶着也不是办法。

斟酌再三，他最后写下：

“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

在这里，只要细心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他话中有话。“实质上”、“企图”、“达到”、“将来”、“欲望”都是虚拟、假定之词，联系到他对林彪，对陈云、周恩来等人一向十分崇敬这个事实，不免令人怀疑，他怎能撇开他们几个，自己去当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呢？既然不可能，那么，这就是违心之词了。

说到错误的性质和危害性，高岗在反省稿的“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破坏党的统一，混乱党的思想，腐蚀党，削弱党的战斗力”这一句后面，又加上“实质上已经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做了敌人所希望做的事情。”

可见，高岗的确是在认真反省，反复思考，而不是草草了事、敷衍应付。他花了不少心血，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既希望比较彻底地实事求是地反省，也有故意上纲上线、加重自己错误的言词，以便能过得了关，得到党中央的认可，从而还能站起来“重新做人”。然而他又不甘心情愿真的承认这些言行，所以又在字里行间留下耐人寻味的推敲之处，多少反映出委曲求全的苦衷。

在誊写反省稿的过程中，他有时问赵家梁是否要写这个或那个，但更多的是有标点符号和个别用字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需要修改补充、讲得更清楚的。例如，在西北部分，补写清楚“渭华暴动”、“临镇脱逃”和两次被捕这三件事；在东北部分，补充了个人突出和缺乏集体领导的缺点错误；在北京部分，添写了“封官许愿”等具体事例。

1954年4月28日下午五点一刻，高岗终于把《我的反省》誊抄完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他又认真通看一遍，在个别地方添了说明性的字句。

尽管他对习仲勋有抱怨情绪，但4月29日上午，还是把反省稿送给习仲勋征求意见。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来，说“在关键问题上检查很不深刻，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这个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习仲勋的看法后，激动、气愤一下都涌上心头：别人不理解我，难道连你习仲勋也不理解我么？他涨红着脸，举起双掌猛击太阳穴，愤愤连呼：“送走，送走！”

赵家梁劝慰他：你不要这样激动，再好好想想嘛。

他呆呆地望着赵家梁一会儿，似在调整情绪，又似在思考怎样修改。稍平静，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写上吧，写上吧！

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已无法思考问题，望着赵家梁，茫然而又无奈地说：“你帮我考虑考虑，添上一句吧！”

赵家梁想了一下，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交给高岗斟酌。

这天深夜，高岗独坐沙发，凝视着那张纸条，良久良久。上床以后，仍长吁短叹，一夜未睡好，不时起床翻阅反省稿。

第二天，1954年4月30日一大早，高岗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刚刚五点多钟，高岗把一张字条交给赵家梁，问：“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它加在哪里？”赵家梁帮他找出来写上。

高岗经过这一夜的斟酌，把赵家梁写的那句话添上了“实质上”、“企图”；去掉了“国家的”这些词。可见其用心良苦，很值得推敲。

他这里用了“实质上”和“企图”两个词，意思是，“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只是一种推论，是分析上纲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行为。

他最后一次仔细看了一遍这份二三万字的《我的反省》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对赵家梁说：那就只好这样了，送走吧。

这时正好是1954年4月30日上午九点。

附：《高岗在北京》拾零

毛泽东的“私房话”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左右摇摆，不怎么稳；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厌迎送外宾和接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国书等事务）。

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1952年春夏，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这话，他对高岗说过，也对其他人说过。

在高岗经常接触，并能与之深谈的领导干部中，陈云是他特别信赖的一个。他曾说：“我把陈云当圣人。”

到中央工作以后，高岗与陈云几乎每天见面或通电话，随时向陈云通报情况，交流看法，得到陈云的支持和鼓励。这次，高岗也赶紧把毛泽东的担忧及自己对设总书记等问题的看法告诉陈云。

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

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治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这些谈话，借以说明他的确没有要篡党夺权的野心。

陈云的说法是，高岗“有野心”，“进行非组织活动”；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

周总理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了。

“有薄无林”的名单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送，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他以为毛泽东一定还会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所以在遇到朱德和邓子恢时，便问他们是否看到这个名单？令他惊讶的是，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后来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说：“你一个组织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定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安子文承认错误，作了检讨。毛泽东没有深追，只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高岗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

1953年11月，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向毛泽东问起“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非常惊讶，也很生气：“你们从哪里知道的？”

后来在中央的小会上，毛主席追查此事，没有人承认。毛泽东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小会上查清楚！”高岗心里明白，是他在广州时泄露出去的。但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如此生气，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更激怒了毛泽东，认为有人对他阳奉阴违，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

高岗很紧张，还是没有勇气当面认错，只含混地说：“饶漱石？恐怕不是吧？”

其实，毛泽东心如明镜。

与陈云的争吵

1954年的早春2月，高岗只感到严冬的冷酷，不觉得一丝春意。

揭批高岗的座谈会，每天下午在总理办公室东边隔壁的小会议室进行。连日来，尖锐激烈的揭发批判使高岗极为震惊，寝食不安，每天开完会回来，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埋头沉思、叹气。

虽然他对陈云最近的表现很有意见，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他还是希望得到陈云的帮助。于是，他请安志文转达了他的要求。经中央同意，陈云便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

高岗对陈云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了对少奇不满的话，怎么现在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

陈云说：毛主席发了脾气，现在正在气头上，一时说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认下来，等毛主席的气消了以后，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高岗一听就火了，气狠狠地说：“我没有野心，没有反对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我只是反对刘少奇，不想让他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一点你最清楚！况且，反对少奇的又不只我一个，你也是一个主要的，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们都说了反对少奇的话，你叫王鹤寿给我送材料，你还从北京派人给我送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为什么现在却叫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我跟你不一样！少奇是有错误，但已经作了自我批评，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嘛。”——陈云急忙辩解。

“可是，‘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你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

两个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

陈云反击：“像你这样冥顽不化，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高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稿往桌上一摔，忿忿而去，出门时满脸冰霜。

高岗也不送他，独自坐在沙发上抽烟、生闷气，脸红红的，十分激动。

1954年2月16日的会上，陈云的发言最后同他划清界限：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毛泽东评高岗自杀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

作者简介：

赵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此后曾在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国家计委工作。

张晓霖，1934年生。原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张明远之女。1983年任张明远的秘书。